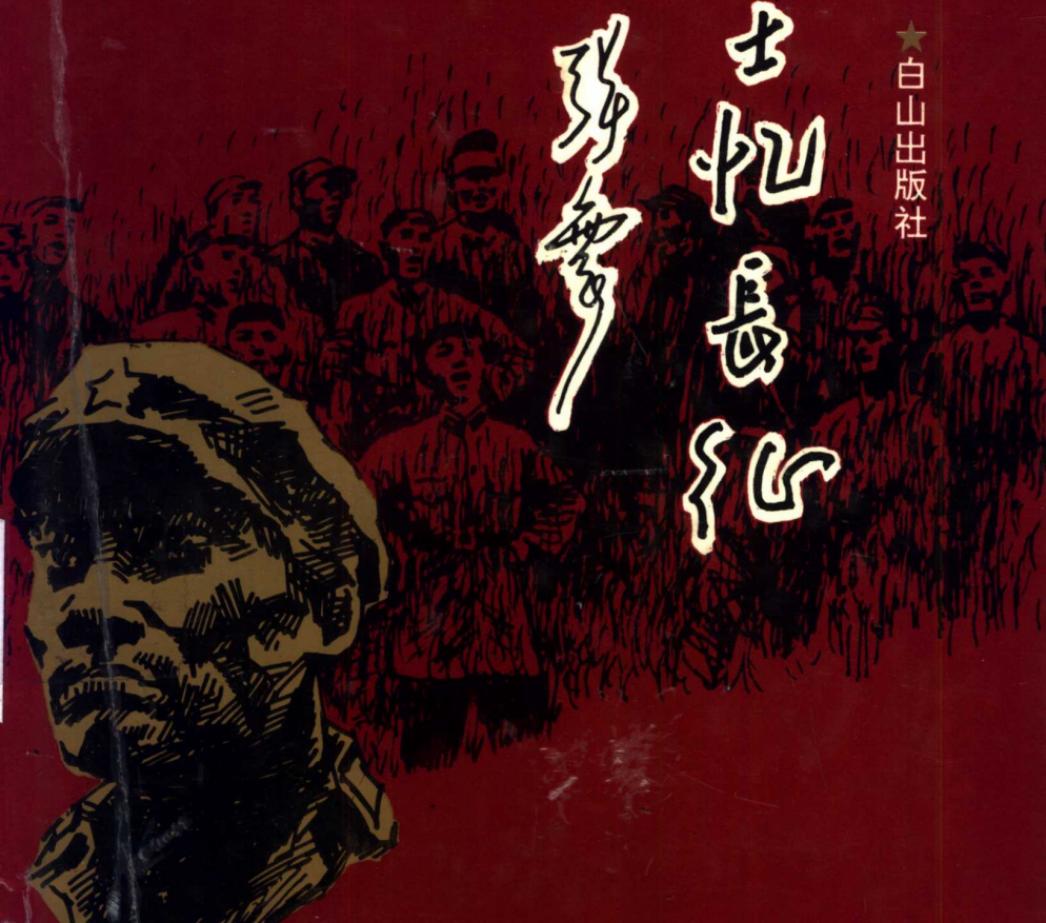


★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

★白山出版社

辽
宁
省
军
区
政
治
部
编
研
室
编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红军将士忆长征》编辑组

主 编：	袁占先	王积行
统 稿：	高月泽	李明计
编 辑：	张 晰	刘东元
	费洪超	张志杰
	许海清	刘一舟

目 录

弘扬长征精神 奔向新的征程	田书根 (1)
回顾长征	刘伯承 (5)
长征纪事	曾思玉 (17)
漫话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王辉球 (26)
长征记忆	邹 衍 (33)
在毛主席身边的生活片断	李 华 (50)
忆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	蓝 兴 (58)
回忆长征时的董振堂同志	耿万福 (62)
长征前夕的大阅兵	林 茂 (67)
长征队伍路过我家乡	陈万明 (71)
活捉敌团长	陈绍林 (74)
二次攻占遵义前后	黄思沛 (77)
红 9 军团四渡赤水	涂通今 (81)
南渡乌江	邱金发 (95)
“党的需要就是绝对的命令”	梁思久 (98)
机智设营队	叶荫庭 (102)
巧过金沙江	陈文陶 (107)
长征中有意义的两件事	曹德连 (109)
与中央首长同越夹金山	谭 诚 (114)
回忆三越夹金山	林 茂 (116)
翻越党岭山	杨学福 (120)
草地七昼夜	黄雨山 (123)

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腊子口	王良太	(128)
攻克腊子口	宋学清	(131)
突破最后一道险关	潘凤举	龙胜 (135)
直罗镇战役前后	贺吉祥	(138)
我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刘幼清	(142)
途经环县	李湘涛	(145)
长征追记	罗洪瑞	(148)
长征琐忆	陈仪	(152)
镌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陈美福	(156)
在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工作的回忆	梁思久	(162)
忆长征时期我军的一支防空部队	叶荫庭	(165)
回忆长征中的工兵连战斗生活	冯志湘	(176)
长征中的侦察连战斗生活片断	陈信忠	(184)
长征中的卫生防疫工作	刘良栋	(191)
长征时的红色卫生学校	陈文陶	(197)
关于东征西征的一些回忆	李荣芝	(201)
“这样的打法要得哟！”	陈朝山	(217)
陕北老乡是我的再生父母	李密	(226)
忆红25军长征	张竭诚	(232)
徐海东同志长征在陕南	程启文	(249)
九间房战斗	刘从本	(254)
跟随红15军团的两年间	李义明	(258)
长征队伍里的“七仙女”	黄学祥	(262)
难忘的中阳老乡	吴业家	(266)
将军山战斗前后回忆	刘转连	(270)
忆长征初期的贺龙同志	贺庆积	(279)
跟随贺老总长征记事	朱汉卿	(290)
跟随王震政委长征	顾文斌	(295)
回忆长征中的卢冬生同志	罗坤山 吴子杰 邓家泰	(301)

回忆红 2、6 军团长征片断	曾茂林	(309)
红 2、6 军团与中央通讯联络的中断及恢复	江 文	(313)
长征路过锡矿山	覃国翰	(316)
绝路逢生	彭绍先	(321)
抢渡金沙江	王志卿	(328)
难忘的艰苦岁月	李宗海	(332)
长征路上的一日	江 冰	(336)
天钓	彭绍先	(340)
长征路上筹粮记	张 试	(348)
红 18 师单独突围长征	彭湘臣	(351)
攻克天险剑门关	陈 康	(362)
忆中坝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	余洪远	(373)
红军进羌寨	何雨农	(380)
挺进懋功	董兴谱	(383)
难忘的长征路	杜国平	(385)
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	张贤约	(390)
跟随朱总司令过草地	牟正荣	(393)
三过雪山草地	严大芳	(412)
雪山草地与食衣住行	张云晓	(419)
长征路上三件宝	杨国喜	(430)
三过草地	吴先洪	(436)
过草地	赵 琨	(445)
两过雪山	吴先洪	(447)
草地战友情	李大清	(452)
记第三次过草地的一支红军收容队	唐青山	(459)
雪山草地的红军大学	王 波	(469)
巧过格达寨	余洪远	(475)
住在炉霍县的回忆	杨学福	(480)
长征中的红 43 团	赵 杰	(483)

生死危难之中的帮助	林春芳	(492)
回忆妇女独立团	何子友	(498)
长征路上姐妹情	孟青	(502)
征途漫忆话巾帼	刘坚	(505)
附：红军长征大事编年	高月泽	(512)
后记		(528)

弘扬长征精神 奔向新的征程

田书根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光辉史诗。这次长征，是在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达到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的总形势下进行的。从1934年秋开始，各路红军先后离开苏区，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苏区胜利会师为止，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过了无比曲折而艰难的历程，最终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以不畏艰难、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气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冲破了敌人严密封锁的无数江河天堑和峭壁险关，战胜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它向世界庄严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在长征万里征途上，红军广泛地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播下了革命种子。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反革命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长征的胜利，使党和红军从危难中挽救了自己，锻炼了干部，锻炼了党，保存了红军基干和大批革命人才；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主力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把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回顾长征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缅怀红军前辈的光辉业绩，总结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

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永葆老红军的本色，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之际，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汇集亲身经历过那场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的 80 余位红军革命老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编写出版《红军将士忆长征》一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收入书中的文章，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笔触，翔实的史料，讴歌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壮举，再现了如史如画的伟大征程，字里行间浸透着发人深思的哲理，句篇蕴涵着催人奋进的启迪。

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要求新一代军人要弘扬长征精神，永葆老红军本色。在本书出版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亲笔为本书题写了《红军将士忆长征》的书名，这是对本书编印出版的极大关怀和支持，也是对军区部队干部战士的深切教育和勉励。

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红军前辈那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鲜明的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部队战斗力、凝聚力的可靠保证，也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指战员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错误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每个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上保持清醒和坚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就要像红军前辈那样牢记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顾大局，讲团结，做奉献。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把方便和生存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困难和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面临着能否坚持我党我军宗旨的新的考验。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四个教育”搞得更加深入，更有成效，使干部战士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无私奉献的精神，做革命的后来人，自觉为中国人民的富裕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不息。

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就要学习红军前辈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用兵的求实作风和科学态度。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通过对敌我双方情况冷静客观的分析，面对凶悍强大的敌人，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即打即离，取得了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在战争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经典剧作。我们要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谋略艺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今天，我们要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围绕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重大课题，认真学习高新军事技术知识，积极探索并掌握现代条件下作战规律。要努力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业务，不断用新的知识丰富自己。要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实做工作，在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里，描绘出无愧于时代的华章。

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还要继承发扬红军前辈所保持的革命战争年代那股劲，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在红军的万里征途中，指战员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终保持旺盛的

斗志。他们以草根、树皮充饥，在草地沼泽中栖身，用血肉之躯向强敌拚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苦难和煎熬，闯过了数不尽的险境绝地。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尚品格，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在和平时期，长征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奋发拼搏的巨大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大力发扬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64字创业精神”，时刻警惕糖衣炮弹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处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永远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高尚的人。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通过长征的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三支红军主力在接近抗日前沿阵地的陕北会师后，立即肩负起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民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成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个又一个重大贡献。当前，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在向着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迈进。愿广大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教益，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优良传统，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为创造祖国和军队更加美好的未来，满怀信心地踏上新的征程。

回 顾 长 征

刘伯承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1931 年 11 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 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 1933 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

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淘宝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

“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掉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5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分成3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2、6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1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

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2、6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2、6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10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2、6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6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3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1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皇南逃。我军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1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壮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

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3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3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1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2、6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1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120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4月下旬，我分3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9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5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